

德國軍事顧問團在華軍事援助研究-以 1937 年「淞滬會戰」為例

鄒琮隆¹ 胡瀚文²

¹ 國防大學陸軍指揮參謀學院

² 國防大學陸軍指揮參謀學院

摘要

中華民國建國初期至完成北伐統一全國，政經局勢得以穩定後，正式進入訓政時期。國民政府為使中國富國強兵，招聘外國軍事顧問協助發展軍事及工業，其中包含二次大戰席捲歐洲戰場的德國，在「中日戰爭」前來華協助我國建軍。從 1928 年第一任德國總軍事顧問鮑爾上校來華至 1938 年第五任總顧問法肯豪森上將，因政治情勢所迫受命返德，這十年間德國軍事顧問團在華期間協助軍制改革、軍火供售、基礎建設及兵工廠設立等貢獻。藉由研究其貢獻及在「淞滬會戰」中日雙方作戰狀況，印證出德國因素在國軍中所產生之影響，作為我軍事思想及戰術運用上參考。

關鍵詞：德國軍事顧問團、蔣中正、淞滬會戰、調整師

壹、德國軍事顧問團來華

外籍軍事顧問到中國協助軍事及工業發展早在清末即已開始，從 1861 年至 1895 年間推動「自強維新」，在這為期 35 年的時間，清代採用「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政策，期能藉由學習西方文化、使國家整體工業化，朝現代化西方國家目標邁進。[1] 因此聘請許多外籍軍事顧問，其中包含德國軍事顧問在內，[2] 李鴻章(1823-1901) 對德採購軍艦、建造旅順港及建立北洋艦隊。[3] 又新軍的建立也備受德國軍事體制所影響。[4] 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對德宣戰及德國的戰敗，其與我國往來及影響而暫時告終。

一、背景與動機

孫中山(1866-1925)先生在革命成功初期為發展實業計畫，於 1913 年曾提出建立中、德、俄三國大陸同盟的區域組織概念，

希望能藉德國之師以壯大中國，所以一直有意計劃聯德，在 1921 年 7 月孫中山先生派朱和中(1880-1940)先生代表中國赴德商議兩國發展合作關係，對於德國的國家制度、科技、技術人才及工業發展等寄予厚望，但因當時德國受制於「凡爾賽條約」，且中國國內情勢區分以北洋軍閥為主的「北洋政府」及以孫中山先生為主的「國民政府」，惟此時期北京政府為國際間認同之中國政權，故此交涉兩國間實際進展並無太大進步，但孫中山先生對德國的各項成就推崇，可以從 1922 年他由廣州赴香港時於船艙上與幕僚談話中所示：

「其與吾國利害相同，毫無侵略顧忌，而又能提携互助，策進兩國利益者，則德國是也。……其固有之人才與學問，皆足資助吾國發展實業，建設國家之用也」。顯見在當時德國的政經軍發展及背

景，可做為我國學習的借鏡，亦為我聯德之主因。

直至 1928 年 11 月 12 日德國軍事顧問鮑爾(Max Bauer,1869-1929)上校一行人抵達我國上海，成為中國現代史上與德國的軍事交往嶄新的一步，[5]這一步也慢慢的引導中德關係走向高峰，然而之所以德國軍事顧問團在此時來華，主因是蔣中正(1887-1975)先生在 1927 年 4 月實施「清黨」行動後，希望由德國軍事顧問接替俄國軍事顧問在華職務，蔣中正先生透過朱家驊(1893-1963)先生協助連繫其德國友人與德國政府接洽軍事顧問來華協助我國發展軍事工業及軍事訓練等事宜。[6]然探究德國軍事顧問來華原因如下：

(一)解決德國工業產能問題尋找經貿市場

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的德國，於 1919 年 5 月被迫在法國巴黎凡爾賽宮簽署「凡爾賽條約」，因而限制其軍事能力、軍事重工業的發展及附加鉅額戰爭賠款。[7]此舉，直接影響德國財政問題並造成民生經濟蕭條。

為解決財政上問題及保存德國固有軍事工業能力，必須向外拓展貿易市場並以軍事海外投資合作作為掩護，[8]確保軍火重工業的發展、研究，或以外銷軍火裝備獲利，既能維持軍事工業能力又能疏緩德國境內財政問題，1928 年中國在蔣中正先生的領導下完成「北伐」，國內政經局勢趨於穩定後，南京政府始獲得國際間各大國認可，積極建軍的中國自然成為德國經貿發展重要對象。

對德國而言，中國領土廣大、資源豐富極具經濟發展潛力且歷經長年內戰緣故，國內需要大量武器裝備及工業、基礎建設作為平亂統一基礎，非常適合成為其軍火工業的重要市場，[9]已利達成德國自身整經備武、擴充軍備之目的。

(二)取得中國富有戰略性原料資源

工業發展需要大量礦石作為基礎，德國本身雖然固然有生產鋼鐵及礦石，但生產量遠不及需求量，所以亟需要仰賴從國外進口，原主要供應國就是鄰近的俄國，但在德國因希特勒出任總理實際掌權後，在其奉行的生存空間理論以作為納粹主義中心思想影響下，兩國造生嚴重的罅隙，[10]進而造成對俄國礦產進口量因而逐年減少，將目標轉向中國使中國成為德國的主要進口國。

中國富有的土地中，蘊藏的礦產不僅價格、產量及品質都符合德國工業需求，尤以鎢砂為製造武器裝備最重要礦產品項之一，在世界鎢礦產量中又以亞洲地區的中國為最，從 1932 年至 1938 年間我國產量占世界總產量的 37.6%，[11]而為支撐德國國內工業發展、整軍備戰的原料需求，需要大量鎢砂這類礦石作為冶煉鋼鐵的重要原料，成為後來中德兩國經濟貿易極速攀升的原因之一，[12]我國更將鎢銻兩種特種礦物開採列為國營統一管制以作為國防軍備所需及作為籌碼對外磋商借貸，[13]成就後來所謂的以物易物，用礦產物資換取軍火裝備的貿易行為，達到兩國互利局勢，也奠定了抗戰初期的國力基礎。

(三)尋找反共政策盟友，圍堵「馬克思主義」

從希特勒(Adolf Hitler,1889-1945)著作《希特勒:我的奮鬥(Mein Kampf)》一書中，其中就提及:「我黨的運動，則在消滅馬克思主義」，[14]可以瞭解到希特勒本人對於馬克思主義、共產黨的敵意與仇視，自從希特勒於 1933 年 1 月出任德國總理後，為使德國整體國力復甦、整經備武，更甚撕毀凡爾賽條約，一連串強勢作風，使得德國再次成為復甦成為軍事強國。

另外從地緣關係角度分析，德國東西

德國軍事顧問團在華軍事援助研究-以 1937 年「淞滬會戰」為例

兩面鄰接俄、法兩國，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民族主義及國家利益衝突下鄰接大國自然成為威脅，而蘇聯東鄰日本、中國兩大國，其中日俄衝突可以從 1904 年「日俄戰爭」日本為侵佔我國東北出兵驅逐俄國軍隊，另我國完成北伐統一政權後，政經局勢穩定自然成為俄國一大隱憂。

故不論是日本軍事實力或是我國地理條件均具備成為強國條件，且在 1927 年國民政府實施清黨後，除剷除國民黨內共產黨員，一併驅逐蘇聯軍事顧問團等行為徹底與共產主義決裂，在諸條件驅使下，中日兩國都足成為德國圍堵馬克思主義的戰友，[15]藉以牽制蘇聯以減低德國自身東面威脅，然後續德國雖因中日開戰關係選擇與當時國力較為強盛的日本同盟抗蘇[16]，並於 1936 年 11 月日德兩國簽訂「反共產國際協定」，但德並沒有因此完全與我國斷絕來往，軍火貿易關係仍持續進行。

二、對我國之軍事援助

在蔣中正先生協請朱家驊先生連繫德國軍事顧問來華後，最先抵達中國的德國軍事顧問鮑爾上校與蔣中正先生會晤中，蔣曾提出三點要求：[17]

1. 德國軍事顧問能接替俄國軍事顧問位置。
2. 德國軍事顧問協助我國整編軍隊並發展軍火工業。
3. 借重德國的科技技術整頓中國經濟發展。

而這正是我國富國強軍所急迫需要，國家在完成北伐統一後，面對日本、蘇聯外強環伺、侵略，必需要做好充足準備，整經備武、提升工業、經濟、國家基礎建設等發展，進而提升國際地位，成為現代工業化國家與列強並駕齊驅。

從 1928 年第一任總顧問鮑爾上校來華至 1938 年第五任總顧問法肯豪森

(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 1878-1966) 因受德國之命召回所有軍事顧問離開中國，這 10 年間德國給予我國相當程度的協助，從軍事建設、工業經濟發展等均有建樹，甚至有歷史學家認為這段時間為「黃金十年」，[18]因而奠定「中日戰爭」成功之基礎。

區分	階級	姓名	任期
第一任總顧問	上校	馬克斯·鮑爾 (Max Hermann Bauer)	1928年11月 - 1929年4月
第二任總顧問	上校	赫爾曼·克里伯 (Hermann Kriebell)	1929年4月 - 1930年5月
第三任總顧問	中將	喬治·魏澤爾 (Georg Wetzell)	1930年5月 - 1934年4月
第四任總顧問	上將	漢斯·馮·塞克特 (Hans von Seeckt)	1934年5月 - 1935年3月
第五任總顧問	上將	亞歷山大·馮·法肯豪森 (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	1935年3月 - 1938年7月

表一：1928-1938 年德軍總顧問一欄表

資料來源：作者製作，整理自馬振犢、戚如高，《蔣介石與希特勒-民國時期的中德關係》（臺北市：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87 年 2 月），頁 53。

以下僅針對軍事顧問在華期間，有關軍事方面援助作探討：

(一) 軍隊整編方面

在軍制改革上，從鮑爾上校來華之初，就開始整編陸軍中央軍校教導隊，並於 1929 年擴編為團級編制，又於次年擴編為師級，[19]此部隊直接受德軍軍事顧問軍事思想薰陶，1932 年蔣中正先生基於東北地區遭日本侵占，為確保軍事院校免受威脅將原設於北平的陸軍大學，遷設南京，並在教育上採用德國參謀學校教育，[20]重點聘用顧問擔任教官，受德式現代化教育之部隊及參謀幹部，在訓練、人員素質及總體戰力上相當堅強，但囿於時間受限及部隊眾多煩雜無法普及全國。

直至第 3 任總顧問塞克特將軍(Hans von Seeckt, 1866-1936)於 1933 年 6 月向蔣中正先生擬提陸軍改革建議書中兩點重要提議，一是建立一支教導旅作為陸軍編制示範旅，二以此旅為模，組建 60 個師的現代化軍隊。[21]

雖說跟鮑爾上校依樣是建立一個模範

單位作為榜，但其編制與原採用的編組方式不同，其建議軍隊整編案在何應欽將軍(1890-1987)時任軍政部長時，報告中提及有以下幾點原則:[22]

- 1.統一部隊編制。
- 2.減少大單位，充實小單位。
- 3.增加部隊戰鬥力。
- 4.軍隊維持費不增加。
- 5.人事經理依法辦理。

塞克特將軍於1933年6月提出是案建議後，翌年12月軍事委員會依蔣中正先生指導，針對此案頒布整編計畫，規劃區分6至8期，以三至四年時間完成全國60個調整師編練。[23]從第一年計畫開始，尚未整編部隊以整理師編制整併，並配合中德軍間火工業發展計畫，期能使裝備維持60個新制師所需，奠定國防工業自給自主基礎，在當時期軍火工業尚未銜接上編改的進程狀況下，主要仍由德國方面供售備戰準備所需各式武器裝備。[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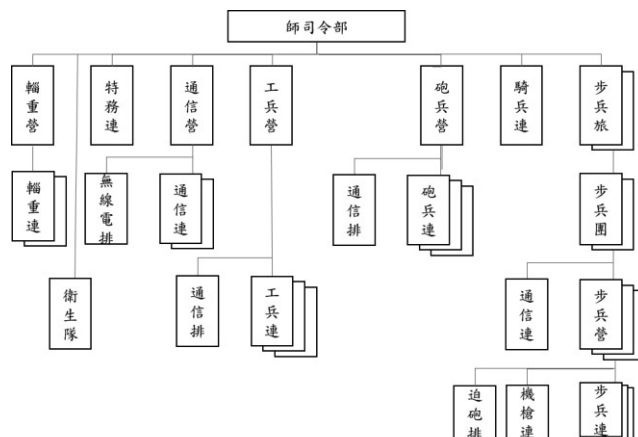
直至對日抗戰爆發，全國陸軍已完成整編及未整編部隊計有182個步兵師、46個步兵獨立旅、43個獨立步兵團、9個騎兵師、6個騎兵獨立旅、3個獨立騎兵團、4個砲兵旅、20個獨立砲兵團、13個獨立砲兵營及其他戰鬥支援、勤務部隊等，共計二百零二萬九千人，[25]從編制上來看砲兵部隊明顯不足，師級部隊內建置的砲兵又因武器獲取的不足，以致於取用小口徑機、迫砲頂替砲兵火力或者缺裝，使缺乏縱深火力的野戰師難以發揮主宰戰場作戰效能。[26]民25年優先調整20個中央軍之步兵師裝備統計，如表二。

梯次	部隊番號	主管	整地補充情形				所缺部隊
			步槍 (缺)	輕機 槍 (缺)	重機槍 (缺)	迫擊砲 (缺)	
第一梯次	第二師	黃杰	7,000	567	126	42	十一連
	第十一師	黃維	4,000	324	72	24	十五連
	第十四師	霍揆彰	4,000	324	72	24	十五連
	第二五師	關麟徵	4,000	324	72	24	十一連
	第三六師	宋希濂	4,500	324	72	24	十三連
	第五七師	阮肇昌	4,000	324	86 (6)	0 (24)	十六連
	第六七師	李樹森	4,000	324	72	24	十三連
	第八七師	王敬久	4,000	324	72	6	十三連
	第二師補充旅	鍾松					十九連 衛生隊
第二梯次	教導總隊	桂永清	9,533	321	132	28	
	第三師	李玉堂	0 (4,000)	324	0 (72)	0 (24)	十二連
	第四師	王萬齡	4,000	324	0 (72)	24	十一連
	第六師	周岳	4,000	216 (108)	72	0 (24)	十四連
	第九師	李延年	0 (4,000)	324	0 (72)	0 (24)	十二連
	第十師	李默庵	4,000	324	0 (72)	24	十二連
	第二七師	馮安邦	4,000	324	0 (72)	0 (24)	十二連
	第八十師	陳琪	4,000	324	0 (72)	0 (24)	十二連
	第八三師	劉戡	0 (4,000)	324	24 (48)	24	十二連
	第八八師	孫元良	4,000	324	12 (60)	24	十一連
	第八九師	王仲廉	4,000	324	0 (72)	24	十一連

表二:民國25年調整二十師概況表

資料來源:作者製作，整理自王正華，《抗戰時期外國對華軍事援助》(臺北市:環球書局，民國76年4月)，頁25-26。

經整編後當時國內軍隊整編編制概區分調整師(如附表三)及整理師(如附表四)兩種，所謂整理師係顧慮到當時財力及裝備能量因素，不能全數調整而另訂設置，使陸軍組織編制統一，而調整師則是為適應現代戰爭需求及裝備上之可能，由中央統一擬定的陸軍甲種編制，首先調整部隊係為直隸屬政府的中央軍。[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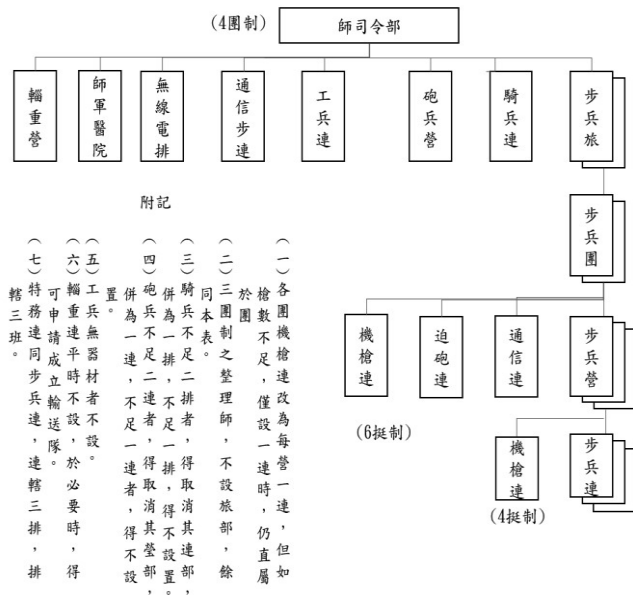


表三:國軍陸軍調整師編制表

資料來源:作者製作，整理自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第一冊》(臺北市: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德國軍事顧問團在華軍事援助研究-以 1937 年「淞滬會戰」為例

83 年 6 月 30 日)，頁 162。



表四：國軍陸軍整理師編制表

資料來源：作者製作，整理自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第一冊》（臺北市：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83 年 6 月 30 日），頁 163。

(二) 武裝軍備方面

德國軍事顧問團協助我國改革軍制，編裝調整自然含蓋其中，從清末以來面臨多年來的內憂外患，直至 1928 年國民政府完成北伐統一全國後，政經局勢趨於平穩，國家才得以將重點置於發展軍備及基礎工業上，且在這之前以美國為首的列強國家為干預中國內部南北議和，於 1919 年 5 月 5 日達成軍火禁運協議，禁止各國武器售華，同時抵制日本獨佔我國軍火市場。

時至 1929 年 4 月 26 日我國政權統一後，才解除長達十年禁運協議，[28]禁運協議政策嚴重影響我國與其他國家間武器軍備發展差距甚鉅，間接造成我國國防武力羸弱，故不論是孫中山先生亦或是蔣中正先生都希望借助德國科技及工業技術發展我國。

基於中、德對等原則，軍售案在德軍事顧問團推動下，德國軍火商相繼來華，其中最為密切且影響最大軍火公司屬合布樓貿易會社，在塞克特任總軍事顧問主導

下，1936 年兩國在孔祥熙(1881-1967)時任財政部長時，於廬山簽訂物品交換貿易合同，[29]後稱「合布樓條約」(HAPRO-Vertrag)，貨貨交易解決兩國間經濟問題，還為我國帶來不僅僅是武器裝備，且併同帶來軍事工業建設發展。

塞克特將軍認為國防需要有相對應工業基礎，整體國家經濟與產業需應和軍事需要，因此在蔣中正先生核准下，德國顧問及相關德國企業積極提案，分於太原、濟南、昆明、重慶、廣東、南寧等地新建兵工廠，清代「自強維新」建設舊式兵工廠也列入改良，使得國內可自產馬克沁機槍及德式迫擊砲。[30]

另蔣中正先生提請塞克特將軍為我國草擬軍備建設執行計畫，塞克特將軍擬軍備工業區分三期在九年內建成，[31]以供應三十萬人部隊所需後勤系統，但三十萬人部隊遠不足以支持國防時需，重點在德國工業技術、人才及設備引進，以奠定國防軍事武力基礎。抗戰爆發前，政府為籌備預期之作戰，大量採購德式軍武，從我國與德國間進出口貿易數據中可參見對於德國軍火購入數量之龐大，足證明當時對軍火武器需求在抗戰前的重要性。

區分	1936年	1937年
預計金額	64,581,000	60,983,000
實際金額	23,748,000	82,788,600

表五：德國武器輸往中國金額表(馬克)

資料來源：轉引自王正華，《抗戰時期外國對華軍事援助》（臺北市：環球書局，民國 76 年 4 月），頁 25-26。

三、軍事顧問團撤離之始末

德國軍事顧問撤離中國是從 1938 年 5 月 21 日開始，由德國納粹政府下令要求所有在華德國軍事顧問返回德國，並立即停止一切在華職務及工作，德駐華大使陶德曼(Oskar Paul Trautmann,1877-1950)遂於當月 23 日通知我國，德又於 6 月 21 日再度重申要求軍事顧問需立刻離開中國，否

則以叛國罪論，[32]直至 7 月 5 日德總顧問法肯豪森等二十六人離開中國後，中德外交關係在抗戰前期全面中止，[33]主要成因乃因當時中日衝突加劇，探究日本為何干涉中德關係及德國為何與我國斷交，分析如下：

(一) 德國立場

德國因軍事顧問團來華一事，逐步使兩國關係密切，我國獲得大量軍火、工業發展及其他軍事協助，德國則取得所需礦產、農產品及外匯，故面對中國廣大軍火市場及礦產原料，德國自不希望放棄其利益，且中、日戰爭對於反共政策將造成極大負面影響，日軍勢必投注大量兵力及資源於中國，最大受益國家將會是蘇聯及共產主義其中包含中國共產黨勢力稍長。[34]

中國軍隊牽制日軍於中國戰場則減輕蘇蒙邊境日軍所造成的威脅，故在抗日戰爭爆發後，蘇聯不僅支持我國抗日，並在 1937 年 8 月 21 日與我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35]經諸般考量德國為避免中日戰爭持續進行，遂德派駐華大使陶德曼先生出面調停，但因當時國內局勢掀起反日浪潮並不支持議和，蔣中正先生在其日記中曾記述道：「二、外線如停，則內戰必起，與其國內大亂，不如抗戰大敗。三、除抗戰以外再無其他辦法」[36]，面對共產黨勢力、全國民心、政治情勢等因素考量，及日本提列和談條件不符合我國利益，最終調停宣告失敗，[37]面對中日兩國的戰爭，德國必須在這之間做出選擇，因而選擇當時較為強盛的日本作為其亞洲地區盟友。[38]

(二) 日本立場

德國軍事顧問團在華協助我國建軍備戰，使得大量德制武器裝備輸往中國、協助軍隊改革及建設軍事工業無疑是增強與

支持中國整體國防武力發展。就中日情勢而言，從日侵華佔領我國東北地區，扶植偽滿州國企圖獲得各國列強承認其為獨立自主政權，日侵華野心表露無疑，然藉由政治手段切斷德國對我國軍事協助，從野戰戰略角度上來看，無疑是切斷我軍其中一條補給線，企圖迫使我國向日軍議和，不斷給予德國政治壓力，使德放棄與我國往來。並以「共同反共協議」的反共名義作為出兵中國理由，均是為達成其戰略目的手段，進而確保在華作戰順遂。

貳、淞滬會戰概述

淞滬會戰自 1937 年 8 月 13 日至 11 月 12 日止，歷經三個月時間，同時也摧毀日軍「三月亡華」企圖，而在淞滬會戰開戰之前，日本早已在 1904 年日俄戰爭後佔我國東北地區，並與當時清廷在隔年 12 月 22 日簽訂「中日滿州善後條約」，[39]其中條款列述俄國在我國東北地區之一切權利完全度讓於日本，此條約雖然是俄國戰敗於日本，但是最大受害者卻是中國，從此我國東北三省領土被日軍佔領，而埋下後續日軍 1931 年引起「九一八事變」遠因，經日本長期侵略我中國，在盧溝橋事變爆發後，蔣中正先生遂籌劃以上海為起點迫使日軍將戰線由東北轉移至上海地區，確保補給線與作戰正面垂直，並迫使日軍呈仰攻之勢的淞滬會戰，會戰歷經三月餘日，參戰部隊死傷慘重，但也打響對日抗戰第一場正規戰，激發全國抗日決心。

一、戰前情勢及雙方作戰準備

在 1932 年 1 月 28 日日本又藉故對我國上海地區發動淞滬戰爭後稱「一二八」事變，藉此對我國政治、經濟最為重要及敏感的華東地區進出，華東地區工商業繁榮、人口密集、教育普及、農業富庶，且貫通國內東西向水路運運輸的隴海、長江水運及浙贛交通網，都以華東為起點，為

德國軍事顧問團在華軍事援助研究-以 1937 年「淞滬會戰」為例

我國經濟往來所必經之地，亦為樞紐，各國爭相在華東地區戮力經營其據點設立租借地，以爭取在華利益，故也成為我國政治最為敏感之地，[40]上海除了是我國陸上交通樞紐外，對外進出而言亦屬於海上交通樞紐，不僅地理位置或條件都屬兵家必爭之地。[41]

在政經方面「西安事變」後，確立蔣中正先生在中國民心地位，剿共步伐也因此停止，促進全國團結一致展開全面抗日。從清末至完成北伐統一以前，國內連年戰亂，工業經濟建設無法有系統逐步完成形成工業化，仍屬農業為主社會型態，直至北伐後抗戰直前 10 年間在中央推動幣制改革銀行制度建立、鐵公路修建、電話網密布、工礦產業中央管制等措施，[42]使中國漸步入工業化。

日本屬於海島國家資源貧瘠諸多原料物資需仰賴進口，最大輸入國為美國、荷東印度公司次之，由於先天條件不足致使在軍事上不利於持久作戰。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工業發展蓬勃，已屬工業化國家，可與西方列強並驅，為解決國內資源問題而遂行大陸政策，向外發展侵略，首當其衝即是鄰近且工業落後的中國。

藉由「九一八事變」出兵侵占我國東北地區，扶植偽滿州國政府，派駐並成立關東軍掠奪東北地區礦產及作物，另以「一二八」事變試探性侵略並被迫簽屬停戰協定，迫使我國在上海地區不得設防，僅保留上海市警備隊、上海市保衛團及江蘇省保安總隊(分別下轄兩個團兵力)。[43]

1937 年 7 月 7 日，日軍駐豐台部隊於盧溝橋周邊實施軍事演習，假藉 1 名日本兵於演習期間失蹤，向宛平城駐軍要求進入宛平城搜尋，駐守宛平城的二十九軍第三十七師第二一九團當即予以否決其要求，雙方遂發生軍事衝突，團長吉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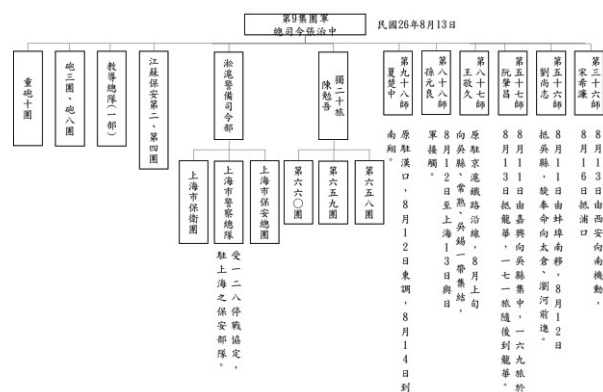
(1908-1958)上校對於日軍攻擊，立即要求所屬部隊自衛反擊，兩軍交戰 4 小時後日軍撤退至永定河東岸，此事件後蔣中正先生於同月 17 日表明中國立場，宣示中國備戰而不求戰、守土準備決戰、談判不失主權及和平勿忘備戰等，在蔣中正先生的抗日發表後，各地紛紛響應，激起了全國抗日同仇敵愾的氛圍，民心所向儼然成為抗日戰爭最有利條件。[44]

(一)國軍方面

國民政府深感對於日本侵華動作絕不僅限於華北地區，故在對日政策上越轉強硬積極整備，軍事委員會為打破日軍速戰迫降戰略目標，制定持久作戰戰略方針，以空間換取時間，利用中國西高東低地廣縱深長地理型態，藉由於上海地區用兵，一可因上海地區列強租借地林立可引起國際間關注，引發列強對於日軍侵華行動給予政治上壓力、二可誘迫日軍作戰線由華北轉向華東地區，形成日軍作戰由東向西造成仰攻之勢，並確保我國作戰線與補給線概略垂直，避免補給線受威脅已期達持久作戰目的，三可使日軍補給線拉長造成補給線維護不易及兵力物資輸送困難等。

初期期能以優勢兵力迅速殲滅上海日軍，使敵後續增援部隊登陸困難，若敵順利登陸則立即集中我軍兵力給予重擊迫敵處於被動，待日軍陸軍轉用主力於上海方面即改採守勢，利用現有國防工事實施逐次抵抗消耗日軍戰力，運用大陸國家與海島國家國力差距，消弭兩國間科技武器裝備及訓練上差距。

8 月 7 日由蔣中正先生召開國防會議決定全面抗戰後，即調派軍隊於淞滬外圍



構築防禦工事、要塞堡壘，並由駐京滬的警備軍(8月13日改編為第9集團軍)張治中(1890-1969年)總司令轄中央軍的第八十七、八十八師等部隊於是年8月向吳縣、常熟與無錫一帶集結推進完成攻擊準備及設防。[45]淞滬會戰初期指揮系統表，如表六：

表六：淞滬會戰初期國軍指揮系統表

資料來源：作者製作，整理自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第四冊》(臺北市：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民國83年6月30日)，頁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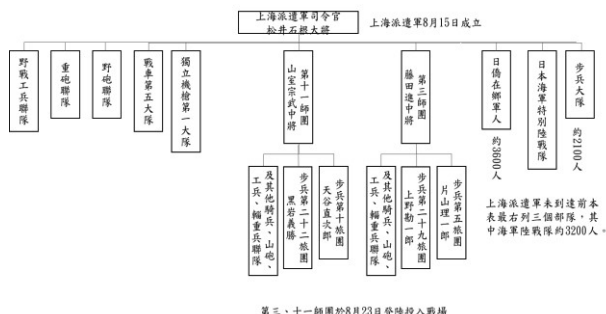
(二)日軍作戰準備

從「盧溝橋事變」開始，全國華人反日聲浪四起，預期中日軍事衝突必然持續加劇狀況下，日軍隨即在所佔我國領土上加緊各軍事準備工作，並將上海地區租借地周邊提升至防禦狀態，設立前推據點並利用阻絕工事、障礙物、沙包及鐵絲網等物資將據點連成一線，形成堅固防禦陣地，並以戰事不擴大及保護在華日僑為初期方針，若戰事擴大則以主力於國軍中央軍團側翼登陸，力求速戰圍殲國軍，後沿太湖兩側進攻直取南京，迫使中國和談。

8月初又調派海軍特別陸戰隊及航空母艦、3艘巡洋艦與12艘驅逐艦增援上海地區守軍，隨同而來的武器彈藥及補給物資日，則日以繼夜的在碼頭上進行下卸，以抵禦預期到來的國軍攻擊。日軍會戰初

淞滬會戰全程依國軍作戰進程區分攻勢(攻擊、反登陸作戰)、守勢、轉進作戰及南京保衛戰等4個時期，初期國軍由張治中將軍所率第九集團軍(下轄編組如附表6)在8月12、13日由第八十七師、八十八師(調整師編制部隊)採先制向虹口、楊樹浦日軍租地攻擊打開淞滬會戰序幕，[46]所屬第三十六、五十六、五十七、九十八師分於13至16日間機動抵達戰術位置，時至14日八十八師先後攻佔八字橋、持志大學及滬江大學等要點，八十七師壓迫日軍於楊樹浦市內均給予日守軍重創，達成奪佔圍攻線之目的。

8月15、16、17日張治中將軍分別下令對上海地區日軍發動三次圍攻，雖給予日軍沉重打擊但在其絕對海空優勢及戰情構築堅強工事掩護下進展有限，但也迫使日軍緊急動員日本本土第三及十一師團編成上海派遣軍增援上海地區作戰。20日第九集團軍接獲相關計畫及敵軍情報，為確保在日軍尚未登陸前擊滅上海地區日軍，遂於是日晨發動第四次總攻，第八八師向虹口攻擊任牽制佯攻、第三十六師任主力指向匯山碼頭、第八十七師向滬江大學攻擊，將士用命與敵接戰傷亡雖大，進展受挫，22日二一六團在混戰中攻佔匯山碼頭突穿敵戰線，分隔敵軍，我軍旋即主力轉用於楊樹浦港西側敵主力之際，豈料日後續登陸船團於吳淞、川沙口一帶逼近，致使戰略態勢驟變，迫使我軍停止攻擊，未能徹底殲滅日陸戰隊主力使戰局陷入膠著。[47]此時期作戰階段國軍空軍由南京指揮，其作戰行動與地面部隊相互獨立，主要針對黃浦江內日軍艦轟炸及偵查。[48]



期指揮系統表，如表七：

表七：淞滬會戰初期日軍指揮系統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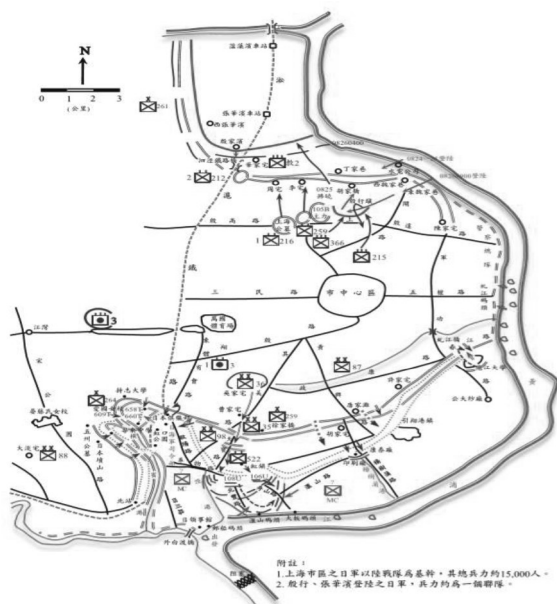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整理自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第四冊》(臺北市：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民國83年6月30日)，頁12。

二、作戰經過概述

22日在日軍第三、十一師團在上海東南馬鞍山群島集結，並於23日晨向川沙口、張華濱登陸，主要作戰地區即轉向川沙

德國軍事顧問團在華軍事援助研究-以 1937 年「淞滬會戰」為例

口、張華濱一帶，地區守軍在敵海空優勢下，無法遏止日軍登陸，激戰後被迫後退，日軍戰力持續稍長，兩軍持續對峙爭奪灘頭陣地，至 9 月 6 日日軍攻佔羅店，使第九集團軍受敵三面包圍，我軍態勢漸趨不利，9 月 11 日依戰區命令進入第二期作戰（防禦作戰時期），第九集團軍遵令退至蘆藻濱、廟行、羅店之線，[49]日軍因戰況進展受阻第三、十一師團傷損嚴重，於 11 日下令增援第九、十三、一〇一師團，及 1 個野戰重砲旅團、迫擊砲大隊及飛行團等投入上海地區作戰。[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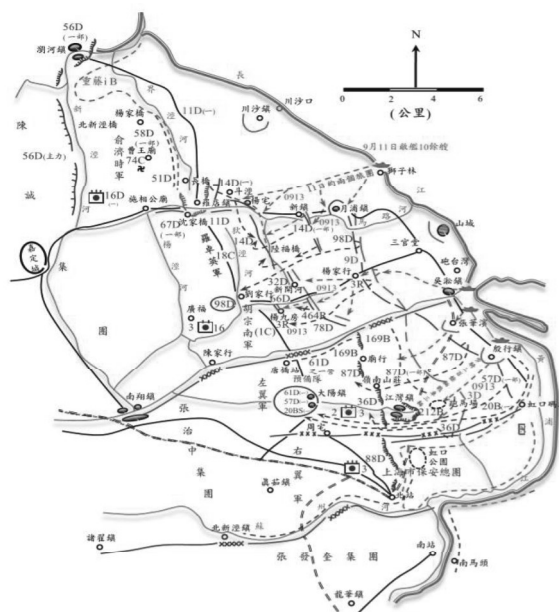
圖一：淞滬會戰初期作戰經過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蔣緯國，《國民革命戰史第三部：抗日禦辱-第五卷》（臺北市：黎明出版社，1979 年 4 月），附圖 5。

9 月 15 日日軍登陸之第三、十一師團轉取攻勢，企圖壓迫國軍於黃浦江而包圍殲滅之，兩師團並列分沿寶羅（寶山、羅店）、寶劉（寶山、劉家行）公路向南翔及嘉定進攻，由張治中將軍所率中央軍及陳誠將軍的左翼軍首當其衝，日軍憑藉空優及砲兵火力與我守軍於羅店-陸福橋之線激戰，17 日止守軍陣地雖屢遭突破，但經逆襲後均順利恢復陣地，惟使我軍傷亡慘重戰況告急，我軍後續增援部隊陸續抵達，各部即調整部署換防，由第六六軍投入第七十七

師、第一五八師接替原右翼軍第三十二師防務，投入教導旅接替中央軍第十四師陸福橋周邊陣地。[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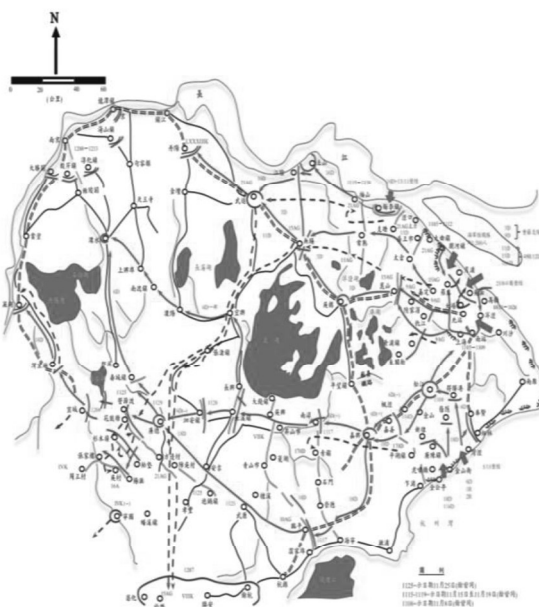
9 月中旬至 10 月下旬戰況，日軍增援之第十軍自 9 月 14 日起分於吳淞口及川沙口附近登陸，陳誠將軍率左翼軍與敵苦戰 20 餘日，先後增援 6 個師反擊日軍但未能成功禦敵，但使日軍蒙受重大傷亡，至此國軍對於淞滬地區作戰先後以逐次投入共約 60 個師之部隊接替作戰任務，戰力折損亦相當嚴重。



圖二：淞滬會戰守勢作戰經過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蔣緯國，《國民革命戰史第三部：抗日禦辱-第五卷》（臺北市：黎明出版社，1979 年 4 月），附圖 8。

10 月 20 日日本大本營鑒於上海地區投入 5 個師團仍無法突破僵局，決定將對華主作戰重點由華北地區轉向華中地區，



遂又下令第十軍(轄第十八、六、一一四師團及其他戰鬥支援及勤務支援部隊)增援淞滬地區作戰,並於11月4日在日本海軍第4艦隊掩護下於杭州灣金山衛以西附近地區突襲登陸成功,[52]11月7日編成「華中方面軍」指揮上海派遣軍及第十軍之作戰。[53]

圖三:淞滬會戰轉進作戰經過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蔣緯國,《國民革命戰史第三部:抗日禦辱-第五卷》(臺北市:黎明出版社,1979年4月),附圖2。

11月8日第三戰區鑒於戰況已無法挽回,遂下令進入轉進作戰時期,主力初期向平湖-嘉善、吳縣-福山鎮既有陣地轉進拒止敵軍,狀況不利時逐次向錫澄陣地(無錫-江陰)及宜武陣地(宜興-武進)轉移,並抽調3-5個師兵力返回南京構築工事,[54]27日日軍突破守軍陣地截斷江陰、無錫交通線,迫使國軍棄守錫澄一線陣地向南京轉進,上海徹底失守,至此淞滬會戰中止。

三、德國軍事顧問對淞滬會戰之評析

德國軍事顧問在1938年7月5日全數離開中國前,參與並於前線指導、觀察我軍對日抗戰前期諸戰役,在淞滬會戰中對於國軍及日軍的作戰表現,於顧問團離華後隔年呈德國陸軍總部報告書中提列,以下整理幾點有關德國軍事顧問對於我國作戰之評析:

- (一)國軍在淞滬會戰作戰成功公算在於會戰初期部隊數量上擁有絕對優勢,可利用嚴密的攻勢作為,配合在浦東地區的7.5卜福斯(Bofors 75mm Model 1930)山砲營及步兵的重武器,對日軍在岸際的戰艦及陸戰隊給予有效射擊,以降低陸上作戰砲火威脅,以摧破日軍後續船團登陸增援之企圖。[55]
- (二)在與日軍陸戰隊作戰失利,首批日本陸軍部隊於8月23日在川沙鎮周邊地區登陸後,德顧問認為雖然日本陸軍

部隊登陸戰力稍長,但國軍仍有機會利用綿密空偵手段獲取當面敵情,期能在日軍的灘頭堡鞏固前,利用連續攻擊擊滅登陸敵軍,但實際上,國軍為避免在日海、空軍艦砲及空中火力威脅下,選擇利用夜暗的掩護於夜間對日軍發起攻擊,因而在準備不足及部隊間無法構成有效協同作戰而失敗。[56]

- (三)國軍前兩階段作戰失利,於9月12日自黃浦江防線撤退後,日軍贏得許多前進基地,以確保其後續登陸部隊可以在不受國軍砲火威脅下實施登陸,國軍在此階段後即由攻勢作戰轉變成守勢防禦消耗戰,但德國軍事顧問認為守勢作戰必須要有積極攻勢行動,例如在10月18日所執行的德國顧問建議之戰術,即成功給予日軍相當打擊,另對於砲兵應針對集結之部隊、戰線後方之後勤設施及指管中心實施打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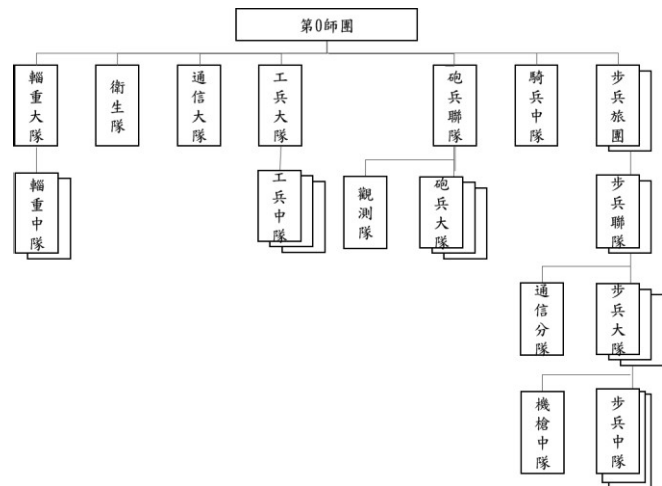
- (四)日軍於乍浦以東的登陸,對國軍而言屬一次奇襲作戰,日軍的登陸造成整個國軍部隊在上海戰線崩解。在會戰爆發初期,蔣中正先生就已令張發奎將軍集團軍任上海集團軍右側翼掩護,然該集團軍指揮領導不力,使得整支部隊被德軍形容成一支憨睡的大軍,對日軍的登陸及運動均未能及時偵知,並立即給予打擊,使上海集團軍南側翼日軍戰力增長快速,嚴重威脅上海地區正面作戰。

參、由淞滬會戰看德國在華軍事顧問團的影響

1928年-1938年德國軍事顧問團在華期間,在軍事上,雙方互惠且大幅進步,就德國軍事顧問對我國軍事貢獻探討,除協助我國陸軍改革組建現代化部隊外,對

德國軍事顧問團在華軍事援助研究-以 1937 年「淞滬會戰」為例

於國防工業、基礎建設及新銳戰術思想的傳授等引進，直接影響我國整體國力提升，構成對日抗戰所需條件，奠定抗戰之



基礎，以下針對其貢獻對於淞滬會戰之影響實施分析：

一、軍隊整編

在軍制改革上從 1928 年國民政府在國內各地方仍處於軍閥割據狀態，各派系指揮官擁兵自重，全國約有 182 個師級部隊，但編制複雜、武器裝備種類制式不一，加上當時國內經濟、工業發展狀況落後，要完成全國部隊軍隊整編及補實缺裝，實不易達成。軍隊的整編需要教育訓練相佐，並考量人事、經理及新式武器裝備之獲得，使可見成效。

因此鮑爾上校於 1930 年建議中央教導團改編師級編制，法肯豪森將軍參考德國二戰國防軍現代化新式陸軍編制，至 1935 年提出符合我國國力及當時情況所制定的軍隊編制建議案，直至 1936 年，國內 182 個師編制種類計有 1930 年教導師編制等 5 種之多(如附表八)，其中各時期砲兵部隊為國軍所欠缺最甚者，缺乏重型砲兵裝備造成火力支援不足，為國軍各部隊普遍現象。

年份	編制名稱	備考
1930年	教導師	德軍事顧問來華初期建議之編制
1930年	陸軍師	後續依教導師調整之編制區分(甲、乙、丙種)
1933年	剿匪師	為因應剿共臨時任務編組
1935年	整理師	後期適應國家現代化調整之編制
1936年	調整師	法肯豪森參考德國防軍建議之編制

表八:1930-1936 年陸軍編制改革一欄表

資料來源:作者製作，整理自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第四冊》(臺北市: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83 年 6 月 30 日)，頁 154-163。

以日軍在抗戰時期陸軍師團級部隊編制(如附表九)與調整師相比較，兵力部分日軍也是採用 2 旅 4 團制為核心編組與國軍雷同，在砲兵火力上日軍師團級部隊建置砲兵聯隊(下轄三個砲兵大隊)，相當於國軍三個砲兵營編制，而國軍僅有一砲兵營及營屬迫砲排，火力對比上差距相當懸殊。

表九:日本步兵師團平時編制概況表

資料來源:作者製作，整理自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第一冊》(臺北市: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83 年 6 月 30 日)，頁 180。

經德國顧問協助整編之整理師或調整師均以 2 旅 4 團制為核心，統一部隊編制，改善 1930 年編制以往 2 旅 6 團制部隊鈍重性高且無法編實等現實缺陷，另整理師編制內之僅步兵團設有迫砲連及機槍連各 1 連，調整師則於每個營下轄一個迫砲排及

機槍連，以增強基層部隊步兵建置火力，並增設通信部隊，團下編通信營，工兵、砲兵另編通信排，使情報傳遞彈性更加強及透明，期能在一定規模下遂行獨立作戰。

而一次世界大戰新興武器「戰車」至對日抗戰直前仍未能於國內量產運用也是宥於當時科技工業及經濟拮据的局勢下，全軍僅有一個交輜學校戰車教導營，致使無法在短期內將戰車編制納入各師級部隊運用，德國軍事顧問團遂無法將德國 1935 年頒布國防法後新式軍事體制原封套用在我國部隊上。

基於種種限制條件下軍事顧問團為我國所制定的調整師、整理師編制戰力雖然不及德國及日軍陸軍部隊，但符合當時期現代化部隊編組型態，在淞滬會戰初期蔣中正先生期望投入國內最精良之中央軍於上海戰場，雖沒獲得戰場上勝利，但充分發揮其戰力重挫日軍，使日軍後續增援第三、十一師團登陸編成上海派遣軍，11 月 5 日投入第十軍及後續由華北轉用於華中地區的第十六師團等，成功迫使其主要作戰由華北轉向華中地區。

隨著現代武器科技不斷進步，為適應現代化戰爭，部隊編組必須適時作出相應調整，提高部隊戰鬥力及生存力，以具備打勝仗條件，近年解放軍軍制改革編成合成旅，我國聯兵營編成，分別賦予強化部隊偵蒐、機動、打擊、補充及指通力，使組織更加緊密、戰場更加透明、指揮更加靈活，期使部隊發揮統合戰力克敵。

二、軍備整備

軍隊戰力係以偵蒐力、機動力、打擊力、補充力及指通力等綜合之，軍事能力要強必須要有強大的經濟力作支撐，而物產資源豐富的中國正好具備成為軍事強權條件，德國軍事顧問塞克特將軍也持相同觀點，故建議推動基礎建設及工業科技發

展，提升整體國力繼而強化軍事戰力。

塞克特將軍主導並促成「合步樓公司」與我政府達成經濟合作協議，如鎢鐵廠籌設、鐵路建設、兵工製造廠設立及改建等，為我國引進各項技術、人才、機械設備等工業發展所需元素，使得部分國防武器(如馬克沁機槍及德式迫擊砲)等在其協助及國人的努力下得以自主產製。此等經濟、工業建設帶動我國經濟發展，成為軍事戰力強而有利後盾。

在顧問團初來華至淞滬會戰爆發直前，10 年期間軍備整備，顧問團對於當時我國內各部隊重武器裝備不足盡收眼底，但囿於財政上不容許且當時陸軍野戰師就有 182 個之多，無法立即充實所有部隊，從民國 25 年調整的 20 個師所欠缺的重機槍及迫擊砲數據可得知，在迫擊砲方面就有 6 個師編成後尚未獲補，強化軍隊偵蒐力、機動力、打擊力、補充力及指通力，提升部隊戰鬥員生存機率，也成為蔣中正先生經綜衡全般局勢後在當時期選擇對上海日軍發動攻勢的有利條件。

經濟為國防武力的基礎，國防武力是經濟發展的盾牌，兩者相輔相成，德國同意派遣軍事顧問來華對我國所行軍事援助是建立在擴展其軍武產能輸出及農產、礦石原料取得等經濟利益上，同時達到其軍事發展需求，反觀我國現立足於台澎金馬地區上土地狹小、資源有限，諸多物資需仰賴貿易進口，借鏡德國作法，我國是否可藉由對外軍售開拓市場，促進國內國防工業競爭及發展，提升國際軍武市場能見度，並取得相當經濟效益。

三、戰術戰法

德國軍事顧問對我國軍事教育協助中，現代化軍事思想的傳授，除部隊戰技、戰鬥訓練外，對於指揮官及參謀團的戰略、戰術戰法運用為首重，但在德軍報告

德國軍事顧問團在華軍事援助研究-以 1937 年「淞滬會戰」為例

中多次指出，我軍參戰的部分高層對於組織指揮作戰並不具備現代化戰爭學能，且在通信聯絡、砲兵運用等失當直接造成部隊重大損害，如：

- 1、後續投入部隊一進抵作戰地區即被快速投入重點方面並遭受重大損傷，對於戰略、戰術預備隊的運用及投入時機均未依計畫執行，且因部隊本身訓練不足致使未產生預期戰鬥效果。
- 2、指揮所未建立應有之體制，分工作業輪班值勤，確保指揮所保持完善運轉機制，欠缺指揮通信器材及情報傳遞手段不足，造成即時戰場情報罅隙無法掌握部隊動態。
- 3、砲兵部隊為避免遭受日軍空中攻擊，佈署於後方過遠地區欠缺彈性，以致於無法有效支援前線步兵達到協同作戰效果等。
- 4、空軍偵查結果未通報陸軍部隊，形成空地各自獨立作戰，且對於日軍杭州灣登陸作戰，部署於右翼軍未即早偵知敵登陸行動，於初期給予猛烈打擊，使日軍順利登陸戰力迅速增長等等情報蒐集及反登陸作為疏失，使得上海戰場遭日軍掌控。

德國軍事顧問指出種種的指揮與戰術作為缺失，實指高階指揮官對於現代化戰爭型態認識粗淺，不願參與軍事顧問教學，使得在戰術運用上未能適時看破好機，選擇至當行動方案完整發揮部隊戰力達成作戰目的，而武器科技的發展，勢必改變現代化戰爭型態，從一次世界大戰機槍的發明，衍生出壕溝戰，一戰後飛機、戰車等戰爭工具興起，對於當時我國並未普及運用及獲得狀況下，在部隊指揮運用上亦未從演習或實戰經驗上深化將士認知，充分顯示出戰術戰法的運用必須與時俱進，且必須上下一體，才能統一戰術思

想，共同達成作戰目的，所以在基礎教育、部隊教育、進修教育需不斷精進、求知求新，從新兵乃至於將官都應有對應軍事教育課程，以適應未來戰爭需求。

肆、結語

德國在我國完成北伐後至對日抗戰初期這 10 年的軍事援助，立足點建立在德國自身利益上，並無絲毫盟國邦交友誼可言，當中、德、日三國在中日戰爭產生利益衝突狀況下，德國權衡比較當時局勢，即向較大利益拉攏的狀況，在現代國際間仍維持著，國與國之間只存在利益並無所謂邦交友誼，面對中共對我國國際地位上的打壓，事實上對於第三方國家而言只是誰能給予的利益較多者勝而已。

從軍事角度而言雖是以德國自身利益為出發點，但對我國軍事援助卻是保持對等互利關係發展，所以協助我國軍隊整編組建現代化部隊、參與演習及抗日戰爭給予參謀建議、各類裝備兵工廠興建等軍事工業發展、鐵路建造、國防基礎工事構築等援助均具相當貢獻。

相較於現今美國與我中華民國外交關係，美國以和平、民主、自由之名，給予我國軍售案、軍事交流等諸多軍事協助，避免我國遭中共併吞，是否也建立於某層面戰略價值之利益上，當條件不復存在，美國基於自身利益考量，是否將不再對我國軍事援助，所以唯有具備足夠能拒敵於彼岸的軍事力量，才可確保臺澎金馬地區安全。

從淞滬會戰戰史例證對應我國臺澎防衛作戰，日軍在優勢海空軍掩護下遂行登陸作戰，國軍為避免遭敵海、空軍直接火力威脅下，放棄對敵登陸初期立足未穩，戰力增長不足的優勢狀況下對日軍實施反登陸作戰，尚失重創敵軍良機，其次則是因偵查及部隊通聯機制缺乏未能通報全

軍，盡早擬訂周全作戰計畫，摧破敵軍登陸企圖，故防衛作戰反登陸作戰之成功，需統合島國可資利用之資源，整合三軍部隊聯合作戰，於敵發航進犯之初掌握當面敵情，針對敵情徵侯部屬岸際火力於敵尚未登陸前折損其戰力，迫使放棄犯臺企圖，確保臺澎金馬地區安全。

參考文獻：

- [1] 王正華，《抗戰時期外國對華軍事援助》（臺北市：環球書局，民國 76 年 4 月），頁 4。
- [2] 藤昕雲，《鐵血軍魂·第一部-蓄勢待發，抗戰前期國民革命軍德制新式中央軍之整建》（臺北市：老戰友工作室，民國 94 年 9 月 3 日），頁 2。
- [3] 楊嘉駱主編，《洋務運動文獻彙編四》（臺北市：世界書局，民國 52 年 7 月），頁 278。
- [4]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第一冊》（臺北市：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83 年 6 月 30 日），頁 145。
- [5] 藤昕雲，《鐵血軍魂·第一部-蓄勢待發，抗戰前期國民革命軍德制新式中央軍之整建》（臺北市：老戰友工作室，民國 94 年 9 月 3 日），頁 5。
- [6] 馬振犢、戚如高，《蔣介石與希特勒-民國時期的中德關係》（臺北市：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87 年 2 月），頁 52。
- [7] Waltschen Gorlitz 著，張鍾秀譯，《德國參謀本部》（臺北市：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52 年 7 月），頁 211-212。
- [8] Waltschen Gorlitz 著，張鍾秀譯，《德國參謀本部》（臺北市：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52 年 7 月），頁 225-226、236-238。
- [9] 王正華著，《抗戰時期外國對華軍事援助》（臺北市：環球書局，民國 76 年 4 月），頁 46。
- [10] 周惠民著，《德國對華政策研究》（臺北市：日盛影印社，民國 84 年 9 月），頁 86。
- [11] 王正華著，《抗戰時期外國對華軍事援助》（臺北市：環球書局，民國 76 年 4 月），頁 62。
- [12] 王正華著，《抗戰時期外國對華軍事援助》（臺北市：環球書局，民國 76 年 4 月），頁 48、52。
- [13] 秦孝儀，《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論》，（臺北市：國民黨黨史委員會，民國 70 年 9 月），頁 370。
- [14] 陳式譯，《希特勒：我的奮鬥》（臺北市：文國書局，民國 73 年 8 月），頁 168。
- [15] 周惠民，《從法肯豪森檔案看德國軍事顧問團(1934-1938)》，發表於二十世紀中國戰爭與政治國際學術研討會，（中華軍史學會，民國 89 年 12 月），頁 10。
- [16] 王正華，《抗戰時期外國對華軍事援助》（臺北市：環球書局，民國 76 年 4 月），頁 69、70。
- [17] 周惠民，《德國對華政策研究》（臺北市：日盛影印社，民國 84 年 9 月），頁 83。
- [18] 周惠民，《從法肯豪森檔案看德國軍事顧問團(1934-1938)》，發表於二十世紀中國戰爭與政治國際學術研討會，（中華軍史學會，民國 89 年 12 月），頁 3。
- [19] 藤昕雲，《鐵血軍魂·第一部-蓄勢待發，抗戰前期國民革命軍德制新式中央軍之整建》（臺北市：老戰友工作室，民國 94 年 9 月 3 日），頁 42。
- [20]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第一冊》（臺北市：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德國軍事顧問團在華軍事援助研究-以 1937 年「淞滬會戰」為例

- 司，民國 83 年 6 月 30 日)，頁 346。
- [21] 藤昕雲，《鐵血軍魂·第一部-蓄勢待發，抗戰前期國民革命軍德制新式中央軍之整建》(臺北市:老戰友工作室，民國 94 年 9 月 3 日)，頁 58。
- [22] 秦孝儀，《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論》，(臺北市:國民黨黨史委員會，民國 70 年 9 月)，頁 375、376。
- [23] 秦孝儀，《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論》，(臺北市:國民黨黨史委員會，民國 70 年 9 月)，頁 324。
- [24] 藤昕雲，《鐵血軍魂·第一部-蓄勢待發，抗戰前期國民革命軍德制新式中央軍之整建》(臺北市:老戰友工作室，民國 94 年 9 月 3 日)，頁 62。
- [25]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第一冊》(臺北市: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83 年 6 月 30 日)，頁 161。
- [26]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第一冊》(臺北市: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83 年 6 月 30 日)，頁 152。
- [27]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第一冊》(臺北市: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83 年 6 月 30 日)，頁 164。
- [28] 王正華，《抗戰時期外國對華軍事援助》(臺北市:環球書局，民國 76 年 4 月)，頁 12。
- [29] 馬振犢、戚如高，《蔣介石與希特勒-民國時期的中德關係》(臺北市: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87 年 2 月)，頁 82、97、98。
- [30] 馬振犢、戚如高，《蔣介石與希特勒-民國時期的中德關係》(臺北市: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87 年 2 月)，頁 309、310。
- [31] 馬振犢、戚如高，《蔣介石與希特勒-民國時期的中德關係》(臺北市: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87 年 2 月)，頁 83-86。
- [32] 王正華，《抗戰時期外國對華軍事援助》(臺北市:環球書局，民國 76 年 4 月)，頁 75。
- [33] 呂芳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臺北市:國史館，民國 103 年 12 月)，頁 552。
- [34] 周惠民，《德國對華政策研究》(臺北市:日盛影印社，民國 84 年 9 月)，頁 177-178。
- [35] 馬振犢、戚如高，《蔣介石與希特勒-民國時期的中德關係》(臺北市: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87 年 2 月)，頁 361。
- [36] 蔣中正，《蔣中正日記抄本》頁，58。
- [37] 周惠民，《德國對華政策研究》(臺北市:日盛影印社，民國 84 年 9 月)，頁 181-182。
- [38] 馬振犢、戚如高，《蔣介石與希特勒-民國時期的中德關係》(臺北市: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87 年 2 月)，頁 362。
- [39]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第一冊》(臺北市: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83 年 6 月 30 日)，頁 26。
- [40]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第四冊》(臺北市: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83 年 6 月 30 日)，頁 218。
- [41]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第四冊》(臺北市: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83 年 6 月 30 日)，頁 219。
- [42]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第一冊》(臺北市: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83 年 6 月 30 日)，頁 132。
- [43] 張國奎、雷聲宏主編，《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四部-抗日第二冊初期戰役》(臺北市: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 83

- 年6月30日)，頁218、219。
- [44] 張國奎、雷聲宏主編，《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四部-抗日第二冊初期戰役》（臺北市：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83年6月30日），頁31、32。
- [45] 張國奎、雷聲宏主編，《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四部-抗日第二冊初期戰役》（臺北市：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83年6月30日），頁219、220。
- [46]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第四冊》（臺北市：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民國83年6月30日），頁29。
- [47]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第四冊》（臺北市：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民國83年6月30日），頁45。
- [48] 藤昕雲譯，《淞滬會戰-德國軍事顧問呈德國陸總部報告》（新北市：老戰友工作室，109年8月），頁28。
- [49]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第四冊》（臺北市：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民國83年6月30日），頁53。
- [50] 曾清貴譯，《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從日俄戰爭到盧溝橋事變-大本營陸軍部（一）》。（臺北市：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78年6月），頁710。
- [51]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第四冊》（臺北市：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民國83年6月30日），頁85。
- [52] 曾清貴譯，《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從日俄戰爭到盧溝橋事變-大本營陸軍部（一）》。（臺北市：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78年6月），頁732、745、746。
- [53]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第四冊》（臺北市：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民國83年6月30日），頁130。
- [54]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第四冊》（臺北市：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民國83年6月30日），頁132。
- [55] 藤昕雲譯，《淞滬會戰-德國軍事顧問呈德國陸總部報告》（新北市：老戰友工作室，109年8月），頁90。
- [56] 藤昕雲譯，《淞滬會戰-德國軍事顧問呈德國陸總部報告》（新北市：老戰友工作室，109年8月），頁91。

德國軍事顧問團在華軍事援助研究-以 1937 年「淞滬會戰」為例

Research on the Military Aid of the German Military Advisory Group in China-Taking the 1937 "Shanghai Battle" as an example

Zou Conglong¹ Hu Hanwen²

1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Army Command and Staff College

2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Army Command and Staff College

Abstract

From the early days of the found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completion of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to unify the whole country,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ituation was stabilized, officially entered the training period,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in order to make China rich and powerful soldiers, the recruitment of foreign military advisers to assist in the development of military and industrial, includ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swept the battlefields of Europe in Germany, in the "The Sino-Japanese War came to China to assis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our armed forces, from Colonel Bauer, the first German General Military Adviser in 1928, to Admiral Fakenhausen, the fifth General Counsel in 1938, because of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forced to return to Germany, the German military advisory group in China during the decade During this period, we assisted in the military reform, arms supply and sale,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ilitary factory, and by studying their contribution and the operational situati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n the "Shanghai-Shanghai War", they confirmed the influence of German factors on the Taiwan army as a reference for my military thought and tact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German Military Advisory Group, Jiang Zhongzheng, Shanghai Battle, Adjustment Division

